

从受助者到助人者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王玉琢

深秋时节,站在玉米大田的地头上,看着隆隆作响的收割机,斯仁塔日瓦高兴地对记者说:“现在收割都是机械化,我种了250亩玉米,再有3天就收割完了。收割的230亩玉米要卖,20亩玉米作为牲畜的饲草料,今年亩产能达到1700斤,又是一个好年景!”话语中流露出欣喜和自信。

斯仁塔日瓦是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昂素镇哈日根图嘎查的一名牧民党员。2012年,一场变故,让斯仁塔日瓦损失了所有牲畜,由于没有其他收入来源,成了嘎查里的贫困户。正当他一筹莫展时,2013年7月,作为帮扶单位的鄂托克前旗审计局

将5000元帮扶资金送到了他手中,还出资3万元帮他盖起了羊棚,发展养殖业。

当接过这些钱时,他感动得泪流满面。作为一名老党员,他当场许诺:“我有手有脚,还有大片的草场,干几年肯定能翻身!争取在3年内脱贫,到时还要偿还这5000元。”

有了政府的帮扶资金,斯仁塔日瓦当年就买了22只羊羔,哈日根图嘎查主任孟克借给他35只母羊,呼日胡嘎查主任苏亚拉图借给他11只母羊,这68只羊成为他发展生产的“初始资本”。本嘎查牧民吉格米特也伸出温暖的手来帮助他,将自己的12头牛放在斯仁

塔日瓦的草场放养,每年给他1头牛作为回报。

勤劳的斯仁塔日瓦还种了50亩苜蓿和250亩青贮玉米,除满足自家牲畜的饲草需要外,剩余的还能卖个好价钱。3年辛勤耕作,他的养殖规模逐年扩大,收入持续增加。2016年,斯仁塔日瓦归还了两个嘎查主任借给他的46只母羊,自己家的羊群也壮大到200多只。这一年,他家纯收入达20多万元,稳稳地脱了贫。

“在政府的帮助下,我用3年时间就脱了贫,现在我也要帮助其他人!”2016年7月1日,斯仁塔日瓦兑现了他的承诺:“3年了,在政府和邻里的帮助下,我从贫困户变

成富裕户,我要偿还3年前政府给我的5000元,让它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贫困户脱贫。”如今,斯仁塔日瓦有5000多亩草场、300多亩地,羊群发展到380多只、牛12头,年收入达到20多万元,日子过得殷实而幸福。

今年已是80岁高龄的斯仁塔日瓦,依然身子硬朗、手脚勤快。说起他由贫困户转变成富裕户,老人感慨万千地说:“党和国家关心老百姓生活,政府和帮扶单位出

钱出力支持贫困户,我脱贫致富了,还要继续帮助没有脱贫的贫困户脱贫致富。”

同嘎查牧民黄文祥做生意失败,成了贫困户。斯仁塔日瓦主动找上门热心帮助他,借给他50只羊,还经常指导他饲养技术,帮助他树立脱贫信心。四邻八舍中,谁家有困难,他总是尽己所能帮助他们。

他常说:“脱贫致富不能忘本,没有党和政府的精准扶贫政策,我不会有

今天。我想用我的微薄之力,帮助和带动困难群众富起来,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我们农牧民一个也不掉队!”

从贫困户到富裕户,在这场脱贫攻坚战役中,斯仁塔日瓦展现出不畏艰难、坚韧不拔、乐观向上的纯真本色,从“我要脱贫”到“我要扶贫”的角色转换,更是彰显了一名牧民老党员的责任担当。



“老渔翁”唐厚运:跨国维权为中国渔民讨回公道

88岁的山东荣成“老渔翁”唐厚运在山东,甚至整个海洋经济行业都是位传奇人物,不仅因为他是为数不多健在的“荣成渔业模式”的缔造者、见证者之一,更是由于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身上有着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抗争意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他6年半的时间6赴日本打赢了一场跨国官司。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荣成市率先发展起海上鲜销贸易,主要对象是日本、韩国。

“这是一项高效创汇产业,但是由于没有组织,各自为战,秩序混乱。”唐厚运介绍,日本代理商趁

机提高代理费,甚至还代而不理,压低鱼价、截留鱼货、中饱私囊,又在质量上挑剔刁难,渔民损失很大。

1999年,作为荣成市渔业协会第一任会长的唐厚运,在日本福冈设立了丰华商会株式会社作为荣成市鲜销出口行业的驻外管理机构,统一协调管理。丰华商会不以营利为目的,鱼货代理费由销货额的6%降到1%,船舶代理费由每航次5.5万日元降到4万日元,过去被日本代理商节流的销货额0.8%的消费税退税也得以返还。这一来,单船每年可节约经营成本几十万元人民币。如果荣成的鲜销船全部

由渔业协会代理,每年可增加经济效益近亿元。

“日本代理商觉得自己的利益受损了,就恶人先告状告到了我国和山东省有关部门,以及日本农林水产省、渔管局等。强加给我‘侵权、走私、不法经营’的罪名,可是后来中日双方的调查结果都证明,我做得光明正大,没有错误。”唐厚运说。

但让唐厚运没有想到的是,与他合作并得到充分信任的日本英华商会会长车兰英,偷刻唐厚运的私章和丰华商会的公章,伪造一份双方假合同,企图长期垄断鲜销渔船的代理权。

一辈子带领乡亲靠海

致富的唐厚运坚决维护渔民们的利益,而最好的解决办法还是诉诸日本法律。2002年1月,唐厚运到福冈中央警察署对车兰英进行了刑事告发,同时向福冈市地方法院递交了民事诉讼状。

可是,福冈市地方法院却仅凭车兰英提供的所谓“证据”,于2003年3月一审判决中方败诉并赔偿车兰英8000万日元“违约金”。

“我就是相信邪不压正,语言不通可以请翻译,法律不懂可以请律师,但是正义必须得到伸张。”唐厚

运说。那些日子平均每个月他都要往返日本几次,上诉的陈述书、证明书、答辩书等材料准备了一大摞。

看到唐厚运要将官司打到底的决心,车兰英胆怯了,多次找到唐厚运提出和解,退回所谓的8000万日元“违约金”,希望不要追究她的法律责任。但唐厚运断然拒绝道:“我不单纯是为了钱,我要讨回荣成10万渔民的利益和中国人的尊严!”他此后多次亲赴日本,重新搜集证据,2003年7月向日本九州高等法院提起上诉。

2005年1月,九州高等法院在查清事实真相后,终审判决中方胜诉,车兰英退还8000万日元的“违约金”。接着又进行了刑事诉讼。2008年6月,车兰英被判刑两年零六个月。这场跨国官司,以中方的完全胜利而告终。当时日本主要媒体都进行了报道,轰动一时。

“人们口头上说说爱国容易,像唐老这样在日本打赢了官司,维护了渔民利益和民族尊严,这才是了不起!”荣成市一位企业家说。(据新华社报道)

弘扬民族精神 奋斗精神

威震敌胆的“独臂将军”刘畴西

从长沙城出发,沿着湘江西岸北行40多公里,就到了刘畴西的家乡——长沙市望城区靖港镇芦江社区。这一带交通便利,环境十分幽雅,刘畴西的故事仍在当地老百姓口中耳相传。

刘畴西,1897年生,湖南长沙望城人。1920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夏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曾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同年11月毕业后,任教导1团3连党代表。1925年,刘畴西在参



加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中负重伤,截去左臂。1927年夏任国民革命军第11军24师参谋,参加南昌起义,后任营长、团参谋长。1929年初赴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

院学习。1930年8月回国,被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0年冬,在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红一方面军在龙冈设伏,担任正面阻击任务的红3军第8师师长龙芝道阵亡,红军总部立即命令刘畴西接替指挥。刘畴西率红8师于东韶拦腰截住敌人,对保证战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红军总部表彰红8师“追如猛虎,守如泰山”。后率部参加第二、第三次反“围剿”。刘畴西英勇善战,指挥若定,屡建奇功,被中央根据地人民誉为威震敌胆的“独臂将军”。

不久,刘畴西调任瑞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为红军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1932年7月调任红21军军长,率部转战闽赣边区,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中央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作战。

1933年,刘畴西任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兼红军新编第10军军长,闽浙赣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率领闽浙赣根据地军民全力支持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反

“围剿”斗争。曾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曾获中革军委授予的二等红星奖章。

1934年7月,中央决定由寻淮洲率领的红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11月,红7军团与刘畴西、方志敏率领的红10军会师,两军合编为红10军团,仍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刘畴西任军团长兼第20师师长。

同年12月,红10军团在浙赣边界的怀玉山区被国

民党军包围。刘畴西率部反复冲杀,浴血苦战,仅有的右臂又被敌人打伤,终未能突出重围,于1935年1月被俘。狱中他坚贞不屈,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对难友们说:“脖子伸硬些,挨它一刀,临难无苟免!”

1935年8月6日,刘畴西在江西南昌英勇就义,时年38岁。新中国成立后,长沙县人民政府给刘畴西的遗孀送去了“伟大英烈”的金匾。(据新华社报道)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